

“改造欧洲”：特朗普 2.0 时期 对跨大西洋关系的系统性重塑^[1]

宋 芳 陈积敏

【内容提要】特朗普第二任期按照“美国优先”的原则对跨大西洋关系进行了系统性重塑：安全上，要求欧洲盟友承担更公平的防务份额，并把欧洲地区的常规防务责任转移给欧洲，且欧洲防务能力的提升需购买美国武器装备；经贸上，不仅通过关税战施压欧洲以实现“对等关税”与市场开放，让欧洲成为美国经济振兴的支持力量，还期待欧洲成为美国开展大国竞争的助力；文化价值观上，指责欧洲背离了与之共享的价值观，支持欧洲右翼势力推动欧洲重振“文化自信”。新一届特朗普政府重塑跨大西洋关系的动因，主要源于“美国优先”的政策取向、极端利己主义的同盟观及 MAGA 派右翼民粹主义意识形态的共同作用。跨大西洋关系的未来，取决于美国政治、地缘政治环境、欧洲政局三个变量，其结果不仅系于美国的“单方面改造”，也受到欧洲对自身身份、价值观与未来世界角色所做根本性抉择的影响。

【关键词】特朗普政府 改造欧洲 美欧关系 责任转移 文化价值观 战略自主

【作者简介】宋芳，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讲师；陈积敏，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美国与拉丁美洲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241 (2026) 04-0025-28

[1] 本文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校级科研项目“特朗普第二任期美欧同盟关系调整及其对华影响研究”（项目编号：2025QN055）的阶段性成果。作者感谢《和平与发展》匿名评审专家及编辑部对本文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文中错漏概由本人负责。

从历史上看，跨大西洋关系一直是美国对外战略的关注重点，欧洲也长期被美国视为推进其全球战略的重要支持力量。尽管特朗普第一任期美欧关系曾经历波折，但拜登政府上台后转变了对欧政策，跨大西洋关系总体保持平稳发展态势，甚至因乌克兰危机等事件而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加强。然而，自特朗普第二任期开启以来，美国的对外战略和对欧政策发生了系统性调整，在包括安全依赖、经贸联系与共同价值观等跨大西洋关系的几大核心要素方面均有明显体现，使得跨大西洋关系进入结构性重塑阶段。

本文拟尝试系统阐释此轮美欧关系重塑的动向与原因，评估其带来的多方面影响，并对双边关系演进前景作出研判，以期为学界和实务界加深对西方联盟政治内在逻辑及全球战略格局走向的理解提供参考。

一、新一届特朗普政府重塑跨大西洋关系的主要动向

跨大西洋同盟传统上由安全依赖、经贸联系与共同价值观三大纽带维系。尽管有些美国总统曾因盟友负担分担或利益分配不均而对上述纽带产生不满，但他们都试图进行策略性调整与修补，而新一届特朗普政府对跨大西洋关系的重塑呈现出颠覆性特征，不仅同时在安全和经贸领域进行重构，更上升至文明与认同的高度，试图在文化价值观层面重新定义同盟关系。

（一）安全关系重构

安全是跨大西洋同盟的核心支柱，欧洲对美国安全保障的深度依赖，导致了“美主欧从”同盟结构的形成。特朗普第二任期试图重构跨大西洋安全秩序，使美欧在责任分担与战略协调之间实现新的平衡。

一是防务费用分担。根据美国经济学家曼瑟·奥尔森（Mancur Olson）与理查德·泽克豪瑟（Richard Zeckhauser）的同盟经济理论，战略目标的一致性会引发“搭便车”行为。^[1]冷战时期美国和西欧都把苏联当作主要

[1] Mancur Olson and Richard Zeckhauser, "An Economic Theory of Alliances,"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Vol.48, No.3, August 1966, pp.266-279.

威胁，双方将维护欧洲安全作为主要目标，美国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欧洲的“搭便车”。而如今，美欧的战略目标产生了分歧：美国把战略重心转向西半球和所谓“印太”地区，欧洲则重点关注欧洲安全。目标的分化导致美国对欧洲防务投入不足的不满愈发强烈。特朗普及其执政团队多次公开质疑北约的效用，称其为一笔“糟糕的交易”。他们认为，美国长期承担着不成比例的安全成本，而欧洲盟友既享受美国提供的安全保障，又通过贸易顺差等方式“从美国身上谋取经济利益”。为此，新一届特朗普政府通过削减驻欧美军规模、重新制定北约军费分摊机制等方式，将安全承诺与财政、军事贡献直接挂钩。2025 年 6 月的北约峰会上，除西班牙等个别国家外，各成员国承诺在 2035 年前将年度防务开支提高至国内生产总值（GDP）的 5%。特朗普迫使北约盟友以同意大幅增加防务费用来换取美国根据《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重申对欧洲的安全承诺，并将这一结果归为自己的“外交胜利”。^[1]同年 12 月，美国五角大楼通知欧洲，欧方必须在 2027 年之前承担更多的北约常规防务责任。如果做不到这一点，美国将停止参与北约的某些防务协调机制。^[2]在 2026 年 7 月举行的北约峰会上，特朗普对多个盟友防务支出不足提出严厉批评，并特别指责西班牙是北约“糟糕的伙伴”，声称要“切断与西班牙的一切贸易往来”。

二是安全责任转移。2025 年 12 月公布的新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称，欧洲必须承担起所在区域的首要责任。^[3]新一届特朗普政府要将欧洲常规防务的主要责任移交盟友，并明确要求欧方将资源和精力最优先聚焦

[1] Nicolas Barotte, “Au sommet de l’Otan, Donald Trump impérial face à la docilité des allies,” Le 26 juin 2025, <https://www.lefigaro.fr/international/au-sommet-de-l-otan-donald-trump-imperial-face-a-la-docilite-des-allies-20250625>.

[2] Gram Slattery and Humeysa Pamuk, “Exclusive: US Sets 2027 Deadline for Europe—Led NATO Defense, Officials Say,” Reuters, December 7, 2025, <https://www.reuters.com/business/aerospace-defense/us-sets-2027-deadline-europe-led-nato-defense-officials-say-2025-12-05/>.

[3]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November 2025, p.12.

于欧洲本土。^[1]美国国防部负责政策的副部长科尔比（Elbridge Colby）将这种“盟友承担欧洲常规防务主要责任”的模式称为“北约 3.0”。^[2]21 世纪初，美国新保守主义代表人物之一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曾用“美国人来自火星，欧洲人来自金星”^[3]来形象地比喻美欧在安全观念上的分歧。北约前秘书长乔治·罗伯逊（George Robertson）更为形象地指出：美国负责“做菜”（军事行动），欧洲负责“洗碗”（维和、稳定与建设）。^[4]但如今，美国和欧洲都成了“火星人”，关于分工的争论现在集中在如何有效生成硬实力上，美国要求欧洲在防务上自力更生。2026 年 5 月 1 日，美国国防部宣布将从德国撤出 5000 名美军士兵。目前驻欧美军中约有一半部署在德国，且美国陆军在欧洲设立的九个驻军基地中有五个位于德国境内^[5]，所以，此次撤军意味着美国将实质性缩减在欧洲的军事存在。在乌克兰问题上，特朗普也要求欧洲承担起保卫乌克兰的主要责任。^[6]根据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的“乌克兰援助追踪”数据库项目统计，美国对乌军事援助在 2025 年下降了 99%，与此同时，欧洲大幅增加了援助拨款，其中财政和人道主义援助较 2022—2024 年平均水平增长了 59%，军事援助增长了 67%”。^[7]

[1] 参见 U.S. Department of State, *Agency Strategic Plan Fiscal Years 2026–2030*, January 2026, p.12; U.S. Department of War,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January 23, 2026, p.19 等。

[2] U.S. Department of War, “Remarks by Under Secretary of War for Policy Elbridge Colby at the NATO Defense Ministerial (As Prepared),” February 12, 2026, <https://www.war.gov/News/Speeches/Speech/Article/4404801/remarks-by-under-secretary-of-war-for-policy-elbridge-colby-at-the-nato-defense/>.

[3] Robert Kagan, “Power and Weakness,” *Policy Review*, No.113, June/July 2002, p.3.

[4] Ian Black, “Europe Must Stop Free-riding on US Military Might, NATO Chief Warns,” *The Guardian*, November 9, 2002,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02/nov/09/eu.nato>.

[5] Lynsey Chutel, “U.S. to Pull 5,000 Troops From Germany. But Plenty More Will Remain,” *The New York Times*, May 2, 2026, <https://www.nytimes.com/2026/05/02/world/europe/us-troops-germany-trump.html>.

[6] U.S. Department of War,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January 23, 2026, p.11.

[7] Christoph Trebesch, Taro Nishikawa, “Europe Steps Up: Ukraine Support After Four Years of War,” *Kiel Policy Brief*, No.203, February 2026, https://www.kielinstitut.de/fileadmin/Dateiverwaltung/IfW-Publications/fis-import/dd24a73f-4270-46c5-9c40-bcc9df4f1672-KPB2023_EN.pdf, p.1.

三是为美国国防工业振兴赋能。美国对欧政策的转变不仅体现在同盟的费用分担和责任转移上，更触及欧洲防务与跨大西洋防务二者究竟是何种关系这一根本性问题。美国一方面不愿为追求“对欧霸权”而过度投入资源，另一方面却频频敦促欧洲国家提升防务贡献，同时又反对欧洲构建自主军工体系的尝试。^[1]自冷战以来，美国一直坚决反对欧共体/欧盟发展脱离北约框架、独立于美国的军事能力。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Albright)提出的“三个 D”原则，即欧洲任何的防务努力都应避免歧视(discriminate)、非欧盟北约成员国、避免与北约和美国安全脱钩(decouple)、避免重复(duplicate)北约既有架构^[2]，就是为了维护美国通过北约体系在欧洲安全事务中享有的主导地位和无可比拟的影响力。同样，即使特朗普一再要求欧洲人负责自己的安全，但本质上却希望欧洲通过购买美国的武器装备来提升防务能力，而不是发展欧洲自己的防务工业。美国国务院公布的“2026—2030 财年机构战略计划”明确敦促欧洲要“支持可靠的美国国防公司，抵制分裂跨大西洋国防工业基础的努力”^[3]，实质就是要求欧洲防务不得独立于美国的防务工业体系之外。

(二) 经贸关系转型

在经贸领域，新一届特朗普政府需要欧洲既扮演一个开放、买单的“大客户”，又扮演一个共担风险、共研技术的“合伙人”，为美国的大国竞争战略布局贡献力量。美国对跨大西洋经贸关系的重塑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构建所谓“对等”经贸关系。二战以来，美国与欧洲国家“因对开放市场和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的共同承诺而团结在一起”。^[4]然而，特朗

[1] Sumantra Maitra, “Europe, the Rationale of Burden Shifting, and the Promise of Germany,” in Emma Ashford and Nevada Joan Lee eds., *New Visions for Grand Strategy*, Stimson Center, September 2025, p.32.

[2] Madeleine K. Albright, “The Right Balance Will Secure NATO’s Future,” *Financial Times*, December 7, 1998.

[3] U.S. Department of State, *Agency Strategic Plan Fiscal Years 2026–2030*, p.12.

[4]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The Looming Transatlantic Trade War,” May 2025, <https://www.iiss.org/publications/strategic-comments/2025/05/the-looming-transatlantic-trade-war/>.

普认为西方过去推崇的所谓“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不利于美国实现重振经济、重塑竞争力的目标，将美国经济困境归因于贸易逆差与制造业外流，并主张用关税调节贸易流向与制造业分布并提高联邦政府财政收入。^[1]在特朗普及其拥趸眼中，关税具有四大用途：消除贸易逆差、推动制造业回流、对冲减税成本、强化谈判优势。^[2]特朗普认为，美国长期被欧盟等亲密盟友通过不公平贸易策略和关税“剥削”^[3]，因而必须重新定义与盟友的经贸关系，将“对等关税”与“贸易平衡”纳入盟友应具备的核心特质，希望通过关税施压，让欧洲市场进一步向美国商品与服务开放，确保美国劳动者与企业获得“公平对待”。^[4]2025年2月美国对欧汽车及全品类商品加征25%惩罚性关税，3月12日生效的25%钢铝关税引发欧盟自4月起对美260亿欧元农产品、科技产品进行反制。双方报复性关税呈现螺旋升级态势：美国威胁对欧盟酒类征收200%关税，欧盟则分阶段对美950亿欧元商品采取反制。同年6月2日，美国将钢铝关税提高至50%；7月12日又宣布对欧盟征收30%关税；7月27日，美欧达成贸易协议，并于8月21日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双方就《互惠、公平和平衡贸易协定框架》达成一致。据此，美国为大部分欧洲商品设定了15%的关税“天花板”，以此换取欧洲的深度市场开放。2026年6月25日，欧盟理事会正式批准了落实联合声明中涉及关税承诺的相关内容，欧盟将取消对美国工业产品剩余的进口关税，并对部分美国海产品及非敏感农产品提供优惠市场准入。

需要指出的是，2026年2月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大规模征收关税违宪，特朗普随即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对全球商品加征10%关税，该临时关税于7月24日到

[1] 凌胜利：《特朗普2.0同盟政策调整的动向、原因与影响》，载《当代世界》2026年第1期，第61页。

[2] Penny Naas, "A Risky Trade," German Marshall Fund of the United States, February 4, 2025, <https://www.gmfus.org/news/risky-trade>.

[3] Patrick Slowinski, "Trump's Redefinition of American Global Leadership," *Foreign Analysis*, June 6, 2025, <https://foreignanalysis.com/trumps-redefinition-of-american-global-leadership/>.

[4]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p.27.

期后，作为“无缝”接续措施，美国又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包括欧盟及英国、挪威、瑞士在内的 60 个经济体加征 10%—12.5% 的 301 关税。这些举措表明，特朗普追求的所谓“对等”，并非基于多边贸易规则与互利共赢原则的真正对等，而是以美国国内法为工具，通过霸道霸凌方式，谋求单方面的主导权和最大收益。

二是为美国再工业化服务。特朗普第二任期的核心目标是推动美国再工业化，重振制造业竞争力。为实现该目标，美国既需要一个稳定且可预期的外部市场以消化回流产能，又亟需大规模外部资本为产业复兴输血，而欧洲恰好同时手握这两张关键牌。美国一方面通过贸易谈判为本土回流的钢铁、汽车及高端制造产品争取稳定的欧洲市场准入条件；另一方面又以高额关税相要挟，逼迫欧洲资本大幅流向美国本土制造业。正如特朗普本人在达沃斯论坛上所警告的：“如果你不在美国生产产品，那你就得支付关税。”^[1]在美国的压力之下，欧盟承诺到 2028 年采购价值约 7500 亿美元的美国液化天然气、石油和核能产品，欧洲企业将在美国战略领域新增投资 6000 亿美元。欧盟还同意购买至少 400 亿美元的美术人工智能芯片。^[2]美国凭借自己在跨大西洋关系中的主导性地位，将欧洲的市场与资本转化为支撑美国再工业化的外部资源，通过双边规则重构将欧洲深度嵌入美国的产业振兴进程之中。

三是助力美国提升经济、科技竞争优势。美国以所谓“减少对特定竞争对手的技术依赖”为借口，持续加强与欧洲的技术合作，聚焦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半导体等前沿领域，力图构建排他性、阵营对抗性的供应链同盟，

[1] The World Economic Forum, “Davos 2025: Special address by Donald J. Trump,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January 23, 2025, <https://www.weforum.org/stories/geo-economics-and-politics/davos-2025-special-address-donald-trump-president-united-states/>.

[2] The White House, “Joint Statement on a United States–European Union Framework on an Agreement on Reciprocal, Fair, and Balanced Trade,” August 21, 2025,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2025/08/joint-statement-on-a-united-states-european-union-framework-on-an-agreement-on-reciprocal-fair-and-balanced-trade/>.

更着眼于在全球科技治理中占据规则制定主导权，通过协调出口管制与投资审查，大搞“脱钩断链”和“小院高墙”，企图阻遏中国在关键和前沿领域的发展，将中国规锁在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从而维护美国的技术优势与科技霸权。美国负责经济事务的副国务卿赫尔伯格（Jacob Helberg）宣称，如果说20世纪的运转依赖于石油和钢铁，那么21世纪的运转则依赖于算力及其所需的矿产资源。^[1]2025年12月，美国主导推出了旨在排斥中国的“硅和平倡议”（Pax Silica Initiative），英国、荷兰、瑞典、芬兰、挪威、德国、希腊等欧洲国家和欧盟相继加入。2026年2月美国在华盛顿召集首届关键矿产部长级会议，并正式启动“资源地缘战略参与论坛”（FORGE），这是一个由美国主导的、具有明显抗衡中国意图的排他性关键矿产国际合作机制，也是拜登政府于2022年发起的“矿产安全伙伴关系”（MSP）的升级版。同年4月，欧盟与美国启动关键矿产战略伙伴关系。

（三）对欧洲文明进行再造

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在1997年出版的《大棋局》一书中写道：“欧洲是美国的天然盟友”，二者拥有共同的价值观和大体相同的宗教传统，实行一样的民主政治。^[2]而新一届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开始否认与欧洲拥有共同的价值观，致使美欧之间深层次的意识形态分歧日益凸显。2025年2月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美国副总统万斯（James David Vance）批评欧洲的言论自由和移民政策，直言欧洲当前最大的威胁并非来自俄罗斯或中国等外部势力，而是其内部正在背离与美国共通的根本价值观。^[3]同年5月，美国国务院发文指责欧洲对西方文明本身发起了“攻击”。^[4]

[1] Jacob Helberg, “Remarks on the Joining of Qatar to the Pax Silica Initiative,” U.S. Department of State, January 12, 2026, <https://www.state.gov/remarks-on-the-accession-of-qatar-to-the-pax-silica-declaration>.

[2] Zbigniew Brzezinski, *The Grand Chessboard: American Primacy and Its Geostrategic Imperative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7, p.57.

[3] Benedikt Franke ed., *Munich Security Conference 2025 Speech by JD Vance and Selected Reactions*, Munich Security Conference, 2025, https://securityconference.org/assets/user_upload/MSM_Speeches_2025_Vol2_Ansicht.pdf, p.16.

[4] Samuel Samson, “The Need for Civilizational Allies in Europe,” Substack, May 28, 2025, <https://statedept.substack.com/p/the-need-for-civilizational-allies-in-europe>.

新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宣称，欧洲正在经历“文明消亡”，经济衰退与其相比“反而显得次要”。^[1]由此可见，特朗普意欲对欧洲文化价值观进行改造，使其符合美国特别是右翼民粹势力的利益。

一是重塑欧洲国家的主权意识。二战后，西欧国家通过让渡部分主权，走上了联合自强之路，从欧洲共同体发展为欧盟，并且成为世界重要的“规范力量”和“民事力量”。然而，在特朗普及其核心幕僚的叙事中，欧洲精英阶层所推崇的激进“全球主义”与“泛人类主义”倾向，实质上侵蚀了西方文明的核心基石——包括西方信仰与价值观、国家主权、言论自由、自由市场以及对政体的认同。新一届特朗普政府尤其将大规模移民视为对国家凝聚力、社会稳定及“西方文明价值观”的结构性威胁^[2]，并据此批判欧盟层面的治理机制削弱了成员国对本国边境与身份认同的掌控权。2026年7月，数万名非法移民涌入西班牙飞地休达引发危机，特朗普将其定性为“对国家主权的入侵”。美国国务院进一步将此归咎于西班牙政府的政策导向，指责其蓄意纵容大规模非法移民，力图证明欧洲因主权让渡而丧失边境管控能力的后果。^[3]新一届特朗普政府试图通过宣扬民粹主义与“主权至上”理念，迫使欧洲回归传统的民族国家主权逻辑。

二是反对欧洲一体化。欧洲人常常援引欧盟的缔造者让·莫内的名言“欧洲将在危机中铸就”为欧洲一体化进程辩护。但如今，欧洲的长期盟友美国却对这一进程的必要性提出了质疑。^[4]事实上，特朗普是第一位公开反

[1]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p.25.

[2] U.S. Department of State, *Agency Strategic Plan Fiscal Years 2026–2030*, pp.11, 13.

[3] 参见 Alex Nitzberg, Greg Norman-Diamond, “Trump blasts Spain migrant surge as ‘catastrophe,’ warns US could face worse if Democrats regain power,” Fox News, July 31, 2026, <https://www.foxnews.com/politics/trump-blasts-spain-migrant-surge-catastrophe-warns-us-could-face-worse-democrats-regain-power>; U.S. Department of State, “This unacceptable incident is the direct result of the Spanish Government’s deliberate efforts to enable and facilitate mass illegal migration into Europe,” July 31, 2026, <https://x.com/StateDept/status/2083197495119626476> 等。

[4] Daniel Fiott, “Europe’s Rearmament Dilemmas,” *Current History*, Vol.125, No.869, March 2026, p.92.

对欧洲一体化的美国总统。在他看来，欧洲一体化进程深受冷战结束后盛行一时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影响，导致欧洲大陆日益衰弱困顿，连有效的自主防御能力都难以形成，更遑论协同支持美国的战略利益。欧洲各国满足于“搭乘美国安全保证的便车”，大幅削减国防开支，任由军事力量日渐萎缩。^[1]因此，美国认为欧盟的一体化模式与美国的优先事项存在根本冲突，欧盟一体化被定性为对“真正的”西方文明的背离，其包容性和超国家模式被视作一种文化威胁。^[2]

三是培育和支持欧洲右翼势力。2025年2月慕尼黑安全会议期间，万斯会见了“极右翼”德国选择党（AfD）领导人爱丽丝·魏德尔，却未与东道主德国时任总理朔尔茨会面。新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呼吁美国直接干预欧洲盟友的民主政治，“在欧洲各国内部培育对欧洲当前发展轨迹的抵制力量”，从而“帮助欧洲修正当前发展轨迹”。^[3]这不仅体现了新一届特朗普政府对近些年来在欧洲政坛涌现的极右翼民族主义政党和运动的公开支持，而且揭示了一个严峻的现实：跨大西洋的主要分歧可能并非存在于美国和欧洲之间，而是存在于跨大西洋的“自由主义者”和“非自由主义者”之间。2025年12月，美国负责公共外交事务的副国务卿罗杰斯（Sarah Rogers）在欧洲会见了多个右翼智库，并与英国民粹主义政党“改革英国党”的关键人物进行了沟通，讨论美国资助这些智库和政党传播“美国价值观”事宜。新一届特朗普政府还认为，大规模移民和“对言论自由的审查”可能导致“文明的消亡”，并将欧洲对包括美国主要社交媒体网络在内的网络内容进行监管的努力解读为对言论自由的攻击。为此，英国的《网络安全法》和欧盟的《数字服务法》都是美国的重点打击对象。^[4]2025年8月，美国

[1] U.S. Department of State, *Agency Strategic Plan Fiscal Years 2026–2030*, p.11.

[2] Riccardo Alcaro, “The Roots of US Right-Wing Hostility toward Europe,” Istituto Affari Internazionali, December 9, 2025, <https://www.iai.it/en/publications/c05/roots-us-right-wing-hostility-toward-europe>.

[3]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p.26.

[4] Anna Gross et al., “US Government to Fund MAGA-Aligned Think-Tanks and Charities in Europe,” *Financial Times*, February 5, 2026, <https://www.ft.com/content/f8696da1-5fe6-4218-be9c-5309bd9a6ae5>.

国务院指示驻欧洲的美国大使馆积极对抗欧盟有关数字服务的法规。^[1]2026 年 6 月，特朗普甚至公开威胁对任何向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的输美产品征收 100% 的报复性关税。同年 7 月，美国国务院推出“在欧洲发展文明纽带、民主韧性和法治”的资助项目^[2]，将向认同“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政治理念的欧洲组织或企业提供最高 300 万美元的资助。

值得注意的是，在特朗普对美欧关系的重塑中，对欧洲的文化再造是前提，是更深层次的重塑。“美国与欧洲国家首先必须成为文明层面的盟友”^[3]，才能在应对外部共同挑战时保持政策协调与行动一致。美国国务卿鲁比奥（Marco Antonio Rubio）认为，跨大西洋联盟最根本的改变在于必须重新审视结盟的初衷，同盟的基础不仅仅是军事协议，也不仅仅是商业合作，而是共同的文明价值观。只有确认双方作为同一文明继承者的身份认同，并将这种文明优越感视为联盟的基石，才能构建联盟的各项机制。^[4]跨大西洋同盟结构性重塑的关键在于文化再造，这也体现出该重塑计划的难度之大，因为美国想要改变欧洲政治结构的文化基础。

二、特朗普第二任期重塑跨大西洋关系的动因

以“美国优先”为核心、锚定“让美国再次伟大”目标的政策转向，是新一届特朗普政府推动跨大西洋关系重塑的根本逻辑：将美国的直接可见收

[1] Humeysa Pamuk, “Exclusive: Rubio Orders Us Diplomats to Launch Lobbying Blitz Against Europe’s Tech Law,” Reuters, August 7, 2025, <https://www.reuters.com/sustainability/society-equity/rubio-orders-us-diplomats-launch-lobbying-blitz-against-europes-tech-law-2025-08-07/>.

[2] U.S. Department of State, “DRL NOFO Developing Civilizational Bonds, Democratic Resilience, and Rule of Law in Europe,” July 13, 2026, <https://www.state.gov/drl-nofo-developing-civilizational-bonds-democratic-resilience-and-rule-of-law-in-europe>.

[3] U.S. Department of State, *Agency Strategic Plan Fiscal Years 2026–2030*, p.13.

[4] U.S. Department of State, “Secretary of State Marco Rubio with John Micklethwait of Bloomberg News,” February 14, 2026, <https://www.state.gov/releases/office-of-the-spokesperson/2026/02/secretary-of-state-marco-rubio-with-john-micklethwait-of-bloomberg-news>.

益作为主要评判标准，以此重构不符合该议程的既有跨大西洋关系框架。

（一）源于特朗普有关跨大西洋关系偏离“美国优先”的执念

冷战结束之后的一个时期，国际格局呈现“一超多强”的态势，美国试图以跨大西洋关系为核心，依托贸易、安全合作与多边机构协调三大支柱，谋求其霸权地位的巩固与延续。^[1]然而，进入21世纪后，新兴力量的崛起深刻改变了美国所处的战略环境，单极格局趋于松动，地缘政治竞争再度成为国际政治的核心议题。^[2]美国发现其难以继续维持全球军事主导地位，若不调整战略，必将耗竭国家资源，加剧国内财政危机，甚至彻底摧毁其全球军事霸主地位的根基。^[3]长期以来，美国的外交政策表面上以稳定、信誉与联盟为“护栏”，通过国际主义理念维系全球领导地位，而特朗普则将这一共识斥为“对他国利益的过度妥协”，主张以单边主义、民族主义与交易性关系重构国际秩序。^[4]新一届特朗普政府宣告，“美国像阿特拉斯（希腊神话中的擎天巨神）一样独自支撑整个世界秩序的时代已经结束”。^[5]美国对国际格局的认知和世界大势的判断发生了变化，特朗普强调权力政治，就是要打破原有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重建以“美国优先”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正如鲁比奥所宣称的，美国绝不能将抽象的“全球秩序”置于核心国家利益之上，所有对外投入都必须回答“是否让美国更安全、更强大、更繁荣”。^[6]在此导向下，新一届特朗普政府的外交行为呈现出退守和聚焦

[1] Sophia Besch, Tara Varma, “Alliance of Revisionists: A New Era for the Transatlantic Relationship,” *Survival*, Vol.67, No.2, April–May 2025, p.7.

[2] Walter Russell Mead, “The Return of Geopolitics,” *Foreign Affairs*, Vol.93, No.3, May/June 2014, p.69.

[3] Christopher S. Chivvis, “How U.S. Forces Should Leave Europe,” *Foreign Affairs*, July 23, 2025,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united-states/how-us-forces-should-leave-europe>.

[4] Steven E. Hendrix, “The Sustainability Crisi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Foreign Analysis*, June 26, 2025, <https://foreignanalysis.com/the-sustainability-crisis-of-american-foreign-policy/>.

[5]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p.12.

[6] U.S. Senat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 *Secretary-designate Marco Rubio SFR Confirmation Hearing Opening Remarks*, January 15, 2025, https://www.foreign.senate.gov/imo/media/doc/6df93f4b-a83c-89ac-0fac-9b586715afd8/011525_Rubio_Testimony.pdf, p.2, p.4.

的新特点^[1]：国内调整军费结构，国际转移安全负担，并大幅削减对国际组织及对外援助的参与，仅在符合美国国家利益时方予介入；守住西半球，同时聚焦亚太应对中国。

基于这一战略逻辑，新一届特朗普政府认为当前的跨大西洋关系无法为美国的霸权存续提供正向增益，反而持续消耗美国的战略资源。美国期望欧洲成为一个能够分担负担、维护西方主导地位并协力应对全球性挑战（尤其是对华战略竞争）的可靠伙伴，而非一个仍需持续扶持、内部脆弱且可能偏离美国轨道的“问题地区”。正因如此，欧洲之于美国的战略重要性正被重新评估。自奥巴马政府提出“重返亚太”和“亚太再平衡”战略起，美国战略重心向亚太转移的趋势已不可逆转，欧洲在美国战略思维中的地位开始系统性下降。拜登政府虽尝试在欧洲与亚太之间搭建桥梁，推动北约“亚太化”以维持欧洲参与度，但特朗普再度上台后更希望欧洲专注于自身事务，让北约进一步向“欧洲化”方向发展。

欧洲长期深度依附于美国军事安全体系，导致其外交决策高度缺乏自主性，全球影响力与战略地位遭受严重侵蚀。这种依附性不仅削弱了欧洲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和行动力，更导致美国从跨大西洋联盟中获取的战略收益递减。^[2] 特朗普甚至将“抛弃欧洲”视为潜在政策目标，减少驻欧美军以聚焦应对中国，同时利用抛弃威胁作为筹码，逼迫欧洲增加对美国武器的采购支出或在贸易、技术标准等领域让步。^[3] 欧洲自身的问题亦加剧了这一趋势——整体防务投入不足、中期改进计划执行缺位、联合行动中对任务分配计较等问题，暴露了美国盟友体系的深层缺陷。^[4]

[1] 樊吉社：《美国外交战略调整：“改造世界”与“美国优先”》，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6年第2期，第25页。

[2] Naman Karl-Thomas Habtom, “European Hedging as a Diplomatic Opportunity for the United States,” Quincy Institute for Responsible Statecraft, April 24, 2025, <https://quincyinst.org/research/european-hedging-as-a-diplomatic-opportunity-for-the-united-states/#executive-summary>.

[3] Giuseppe Spatafora, “The Trump Card: What Could US Abandonment of Europe Look Like?” The European Union Institute for Security Studies, February 17, 2025, <https://www.iss.europa.eu/publications/briefs/trump-card-what-could-us-abandonment-europe-look>.

[4] Barry R. Posen, *Restraint: A New Foundation for U.S. Grand Strategy*,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5, p.35.

（二）源于特朗普极端利己主义的同盟观

自跨大西洋同盟缔结以来，美国一直把欧洲视为实现、维护、延伸美国国家利益的重要盟友。历届美国政府都把盟友视为美国的重要资产，是美国行使全球权力的“力量倍增器”，因而会在很大程度上尊重盟友的利益、满足盟友的诉求。然而，在特朗普看来，盟友的利益远不如美国自身的利益重要。^[1] 特朗普不相信联盟，他相信的是扩张自己的影响力和权力^[2]，并把“交易原则”作为处理与盟友关系的核心原则。现实主义认为，国际体系处于无政府状态，国家作为理性行为体，其外交政策的核心动机是追求权力与安全利益的最大化。在这一逻辑下，联盟并非基于共同价值观或规范认同，而是国家间利益交换的临时性工具。^[3] 特朗普将同盟关系简化为成本与收益的核算，强调欧洲盟友必须通过增加财政贡献来“证明”其战略价值，美国在联盟中提供的安全保护则被重新定义为一种需要盟友付费的“服务”。当美国维持跨大西洋联盟的安全投入与经济负担持续超过其战略收益时，作为联盟主导国，它将重新评估同盟的价值，并倾向于缩减安全承诺、降低制度性参与，或要求欧洲盟友承担更大比例的防务责任，而非无限制地维持既有义务。

特朗普对多边联盟体系存在根本性质疑。在特朗普看来，北约的扩张及额外的安全义务与美国的核心利益并无直接关联^[4]，反而可能将美国卷入不必要的冲突。新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更是终结了将北约作为永久扩张联盟的认知和现实，并强调单纯是北约军事盟友或长期合作伙伴

[1] John Blaxland, "Trump's View of the World Is Becoming Clear: America's Allies Come Second to Its Own Interests," *The Conversation*, February 18, 2025, <https://theconversation.com/trumps-view-of-the-world-is-becoming-clear-americas-allies-come-second-to-its-own-interests-250144>.

[2] Ana Swanson, "A Second Trump Term Is Set to Scramble Trade Alliances," *The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6, 2024, <https://www.nytimes.com/2024/12/06/us/politics/trumptrade-alliances.html>.

[3] [美] 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王义桅、唐小松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36 页。

[4] Stephen Wertheim, "The End of Illusion: Why Europe Needs Independence from the United States," *Survival*, Vol.67, No.2, April - May 2025, p.40.

并不足以让其成为美国的可靠朋友，关键应在于其是否拥有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1] 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称，如果美国需要北约盟友的支持，他“不确定”北约是否会保卫美国，因为欧洲盟友只是一味单向索取。^[2] 2026 年 2 月底美以伊冲突爆发后，法国、德国、西班牙等北约核心盟友拒绝美国战机使用其领空，这触及了特朗普长期以来对盟友不满的核心。

这种现实主义的同盟观，让美国以更务实、更功利的心态处理与盟友的关系，不仅要摆脱同盟关系对美国的束缚，更要求盟友同样遵循现实主义逻辑行事。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思（Peter Brian Hegseth）强调：“持久伙伴关系的基石，并非建立在理想主义的价值观之上，而在于国家利益的切实契合。”^[3] 白宫负责政策的副幕僚长兼国土安全顾问斯蒂芬·米勒（Stephen Miller）称，现实世界是由实力、武力和权力统治的，这是历史的“铁律”。^[4] 美国的行为逻辑已经改变，其权力不再为民主、集体安全或基于规则的秩序服务。新的逻辑是：权力即法理，强者统治因为其实力使然。^[5] 因此，新一届特朗普政府以强势的极限施压，迫使欧洲盟友做出让步和改变。美国哈佛大学知名国际关系学者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M. Walt）将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描述为“掠夺性霸权”——将所有双边关系视为本质上的零和博弈，并力求从每段关系中攫取最大利益；如果盟友不能带来足够的不对称利益，就会被抛弃或无视。^[6]

[1]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p.27.

[2] The Senate Democratic Caucus, “Transcript: President Trump Speaks with Maria Bartiromo on Fox Business, 1.22.26,” January 22, 2026, <https://www.democrats.senate.gov/newsroom/trump-transcripts/transcript-president-trump-speaks-with-maria-bartiromo-on-fox-business-12226>.

[3] U.S. Department of War, “Remarks by Secretary of War Pete Hegseth at the 2026 Shangri-La Dialogue in Singapore (As Delivered),” May 30, 2026, <https://www.war.gov/News/Speeches/Speech/Article/4504755/remarks-by-secretary-of-war-pete-hegseth-at-the-2026-shangri-la-dialogue-in-sin/>.

[4] “Stephen Miller Says US Is Using Military Threat to Maintain Control of Venezuela,” CNN, January 5, 2026, <https://www.cnn.com/2026/01/05/politics/video/senior-white-house-aide-stephen-miller-says-us-military-threat-to-maintain-control-of-venezuela-digvid>.

[5] Fareed Zakaria, “Trump Is Teaching the World to Fear America,” *Foreign Policy*, January 9, 2026,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6/01/09/trump-fear-united-states-alliances-global-power-balance/>.

[6] Stephen M. Walt, “The Predatory Hegemon: How Trump Wields American Power,” *Foreign Affairs*, Vol.105, No.2, March/April 2026, p.14.

（三）源于 MAGA 派右翼民粹主义意识形态的驱使

特朗普还把美国国内的文化战争，转嫁到了欧洲社会。这种文化战争源于美国保守派对于本国人口结构快速变化、族群日趋多元化的焦虑情绪。^[1] 新一届特朗普政府对欧洲文明的攻击本质上是要将欧洲国家转变为非自由主义政权，以摧毁自由主义欧洲对自由主义美国的支持。MAGA 派精英阶层认为，仅仅赢得总统大选并不足以成功改变美国，必须攻击所有自由主义权力的堡垒，而欧洲是自由主义的堡垒之一，欧盟官僚主义严重、阻碍发展，本质上是美国自由主义发展和监管模式的延伸。对此，特朗普也是深恶痛绝。这在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ECFR）研究主任杰瑞米·夏皮罗（Jeremy Shapiro）看来是特朗普及 MAGA 群体将欧盟归类为“支持美国自由派势力”的一个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讲，针对欧盟（以及欧洲其他自由主义政权）的斗争，实际上成为了美国右翼民粹主义势力与国内自由派政治斗争的延伸。^[2]

美欧双方在“西方”的核心要义以及大西洋两岸哪一方更能捍卫西方核心价值这两个问题上存在根本性分歧。欧洲人认为，欧洲国家各类民主指标的排名普遍高于美国，并且西方的核心价值应比种族与宗教更为重要。^[3] 但在美国 MAGA 派看来，欧洲已然堕落，这个西方文明的发祥地通过拥抱无神论、开放移民政策与推行自由派文化政治，实质上背弃了西方文明传统。^[4] 特朗普对西方世界的构想，明显区别于以自由主义和世俗化为特征的传统欧洲模式，而更倾向于与主权主义政权结盟。^[5] 这一意识形态立场早在 2017 年

[1] David Luhnow, “Is ‘The West’ Over?”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December 26, 2025.

[2] Ian Ward, “Why Does Trump Disdain Europe?” *Politico*, December 10, 2025, <https://www.politico.com/news/magazine/2025/12/10/why-trump-is-waging-a-culture-war-on-europe-00685806>.

[3] David Luhnow, “Is ‘The West’ Over?”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December 26, 2025.

[4] Andrew Gawthorpe, “Civilizational Wilsonianism from Woodrow Wilson to Donald Trump,”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101, No.1, January 2025, pp.190–191.

[5] Nicholas Morieson, “Trump, Trade, and the Fracturing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July 29, 2025, <https://www.populismstudies.org/trump-trade-and-the-fracturing-of-western-civilization/>.

其于华沙的演讲中便已初步显现：彼时，他警告称西方的安全与生活方式正面临严峻威胁，并盛赞波兰为“坚守西方文明核心价值观的典范”，同时暗示其他欧洲国家已遗忘或背离这些价值观。^[1]如今，特朗普要把欧洲改造成他理想中的样子，将欧洲自由派视为他国内政治敌人的延伸，并正在稳步推进相关计划^[2]；而 MAGA 派扶持具有相同价值观的欧洲右翼民粹主义者，批判欧洲自由派政府的移民政策，惯于干涉他国内政。美国国务院则明确要求美国各驻外使领馆向欧洲及其他西方国家政府施压，特别是传达“移民引发犯罪、危害社会凝聚力与公共安全”的论调，目标是“争取驻在国政府和利益攸关方的支持，以解决和改革与移民犯罪、捍卫国家主权及确保当地社区安全相关的政策”。^[3]

特朗普及其 MAGA 团队将基于价值观的外交转化为一种带有文化强制色彩的政策工具，通过单边权力施压，迫使他国在文化与价值观层面服从美国的单一标准。美国政府以“审查美国公民网络言论”为由，对欧洲官员实施签证禁令，声称美国的言论规范凌驾于旨在遏制仇恨言论和虚假信息的欧洲法律之上。这传递的意识形态信息十分明确：遵守美国文化价值观如今已成为欧洲与美国合作的先决条件。特朗普将匈牙利前总理欧尔班、法国国民联盟领袖玛丽娜·勒庞和罗马尼亚“罗马尼亚人团结联盟”领导人乔治·西蒙等极右翼人物奉为“文明盟友”，同时公开嘲讽欧洲的自由派领导人。2025 年 3 月，来自大西洋两岸的极右翼智库举行会议，讨论如何从内部瓦解欧盟。^[4]2026 年 7 月，英国《卫报》披露，特朗普政府将通过美国国务院向欧洲保守派组织提供总额 1200 万美元的资助。其中，700 万

[1] The White House, “Remarks by President Trump to the People of Poland,” July 6, 2017, <https://trumpwhitehouse.archives.gov/briefings-statements/remarks-president-trump-people-poland/>.

[2] Chris Herrmann, “Trump’s Quest to Transform the West,” ECFR, August 11, 2025, <https://ecfr.eu/article/trumps-quest-to-transform-the-west/>.

[3] Edward Wong and Hamed Aleaziz, “U.S. to Press Europe and Other Allies on ‘Mass Migration,’ Document Says,” *The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26, 2025, <https://www.nytimes.com/2025/11/26/us/politics/trump-rubio-mass-migration.html>.

[4] Chris Herrmann, “Trump’s Quest to Transform the West,” ECFR, August 11, 2025, <https://ecfr.eu/article/trumps-quest-to-transform-the-west/>.

美元计划提供给自称以“复兴犹太-基督教文明”与“终结大规模移民”为宗旨的英美极右翼智库“878”组织；另外500万美元则将资助给倡导保守主义和“反觉醒”文化的“国际言论自由联盟”。^[1]总之，特朗普第二任期意图通过结构性削弱欧盟、实现跨大西洋右翼势力政治文化合流来主宰欧洲^[2]，特别是终结“由欧盟所代表的那个旧秩序”，并试图扶持一个在文化、经济和外交上更贴近“美国优先”愿景的“新欧洲”。

三、特朗普第二任期重塑跨大西洋关系的影响

新一届特朗普政府从安全、经贸、价值观三个维度改造欧洲，力图重塑跨大西洋关系，使其更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这势必带来多方面的影响。

（一）推动美欧关系的结构性调整

美国要求欧洲承担更多的防务费用、欧洲的安全主要由欧洲负责，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美欧关系将朝着更加平等的伙伴关系发展。“美主欧从”的等级结构正在向更为平等的结构转变，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乌克兰危机和特朗普的改造欧洲计划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这种进程，导致欧洲安全和防务政策发生巨大转变。新一届特朗普政府“追求的是伙伴关系，而非依赖关系”，希望构建一个以欧洲为主导、自主防卫的均衡联盟“北约3.0”^[3]，同

[1] Aisha Down, “Trump administration to grant \$12m to groups founded by UK conservatives Jacob Rees-Mogg and Toby Young,” *The Guardian*, July 17, 2026, <https://www.theguardian.com/us-news/2026/jul/17/trump-administration-to-grant-12m-to-groups-founded-by-uk-conservatives-jacob-rees-mogg-and-toby-young>.

[2] Riccardo Alcaro, “The Roots of US Right-Wing Hostility toward Europe,” *Istituto Affari Internazionali*, December 9, 2025, <https://www.iai.it/en/publications/c05/roots-us-right-wing-hostility-toward-europe>.

[3] 参见 U.S. Department of War, “Remarks by Under Secretary of War for Policy Elbridge Colby at the NATO Defense Ministerial (As Prepared),” February 12, 2026, <https://www.war.gov/News/Speeches/Speech/Article/4404801/remarks-by-under-secretary-of-war-for-policy-elbridge-colby-at-the-nato-defense/>; “Remarks by Secretary of War Pete Hegseth at the 2026 NATO Defense Ministerial in Brussels (As Delivered),” June 18, 2026, <https://www.war.gov/News/Transcripts/Transcript/Article/4521023/remarks-by-secretary-of-war-pete-hegseth-at-the-2026-nato-defense-ministerial-i/> 等。

时优先考虑与中国的战略竞争，并以更有针对性、更远距离的方式支持欧洲安全^[1]，提供核安全保障。这是美国构想战略上的最优模式，一个军事上更强大、防务更自主的欧洲能够有效分担美国在欧洲方向及周边区域的安全责任，让美国得以将战略资源与军事力量转向“印太”，形成“欧洲抗俄，美国遏中”的角色分工。

然而，新一届特朗普政府所构想的跨大西洋关系图景，是以单方面改造欧洲为主，并没有尊重欧洲的意愿、考虑欧洲的实际能力，因而严重动摇了美欧之间的信任基础。欧洲日益认识到，美国的行为模式已发生根本性转变，其领导地位不再被视为可靠的利益保障。^[2] 双方的分歧在具体议题中进一步放大。乌克兰危机中，美国军援的随意性和承诺的反复无常让欧洲盟友陷入困境。同时，对中东冲突的处理方式差异也加剧了双方摩擦，新一届特朗普政府在巴以问题上的立场特别是对加沙危机的态度，与支持埃及主导和平倡议的欧洲产生了直接冲突。^[3] 美国在 2026 年 2 月底军事打击伊朗前并未与欧洲领导人讨论其计划，因此，欧洲各国政府与随后的战争保持了距离。^[4] 此外，特朗普多次表达希望将格陵兰岛并入美国的意愿，甚至一度威胁使用武力夺取，2026 年 7 月底还给出了 2029 年 1 月其总统任期结束前“控制”该岛的时间表。^[5] 特朗普这么做屡次冲击欧洲的战略容忍

[1] Gorana Grgić, “NATO would survive a US withdrawal. But what kind of alliance would it become?” *The Conversation*, May 18, 2026, <https://theconversation.com/nato-would-survive-a-us-withdrawal-but-what-kind-of-alliance-would-it-become-282723>.

[2] Celeste A. Wallander, “Beware the Europe You Wish For,” *Foreign Affairs*, Vol.104, No.4, July/August 2025, p.24.

[3] Giorgia Valente, “Europe Takes Charge as US Shifts to Transactional Foreign Policy,” *The Media Line*, March 11, 2025, <https://themedialine.org/top-stories/europe-takes-charge-as-us-shifts-to-transactional-foreign-policy/>.

[4] Wolfgang Ischinger, “The Transatlantic Alliance Can’t Survive Without Trust Washington Dismisses NATO’s Value at Its Own Peril,” *Foreign Affairs*, July 6, 2026,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united-states/nato-transatlantic-alliance-cant-survive-without-trust>.

[5] “Trump Predicts US Will Control Greenland by 2029: ‘Make That Bet’,” *Newsweek*, August 2, 2026, <https://www.newsweek.com/trump-greenland-control-2029-make-that-bet-12275042>.

阈值，打破了欧洲对美国作为可信盟友的长期预期。一直主张强化北约力量并密切欧美关系的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认为，特朗普在短短数月内扭转了美国对基辅的支持，拉近了与莫斯科的距离，并拆解了数十年来支撑欧洲安全的西方联盟；“就像一只花瓶被打碎后，即便重新粘合也不再是原来的模样”。^[1]

（二）促使欧洲加速战略自主

特朗普对欧洲的改造，本质上是希望欧洲能为美国的战略利益服务，却不可避免地刺激了欧洲加速战略自主的进程，直接宣告了欧洲对美依赖时代的结束，迫使欧洲正视与美国关系转变的现实。正如西班牙前外交大臣阿兰查·冈萨雷斯·拉亚所言，“特朗普政府对传统跨大西洋联盟的敌意，可能是自1948年欧盟奠基以来，推动欧洲一体化进一步深化的最具影响力的触发因素”。^[2]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强调，欧洲“今天正在经历的剧变，实际上是构建一种新型欧洲独立的契机，甚至是必然之举……是一种由来已久的结构性必然”。^[3] 欧洲的安全将难以再依赖于美国的资源投入，而是更多地取决于欧洲的自身威慑、投资和塑造地区稳定政治格局的能力，战略自主是其迫在眉睫的生存必需。欧洲正通过提升防务能力、增强技术主权及贸易多元化来应对特朗普政策带来的冲击。

在防务领域，欧盟和欧洲国家展开了从战略谋划到政策实践方面的应对，不仅包括战略文件的更新与防务预算的提升，更涉及核安全与核威慑领域的深度合作。德国总理默茨表示，面对日益严峻的国际安全挑战，欧

[1] “EU top diplomat Kallas seeks footing as Trump upends West,” *France 24*, April 24, 2025, <https://www.france24.com/en/live-news/20250424-eu-top-diplomat-kallas-seeks-footing-as-trump-upends-west>.

[2] Arancha González Laya, “The Resurgence of Europe,” *Foreign Affairs*, May 12, 2025,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europe/resurgence-europe-how-survive-american-antagonism>.

[3] European Commission, “Special Address by President von der Leyen at the World Economic Forum,” January 20, 2026,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speech_26_150.

盟必须转型为欧洲防务联盟。^[1]2025 年 3 月欧盟发布《欧洲防务未来白皮书》和《欧洲重新武装计划 /2030 战备计划》，计划通过增加国防工业投资、鼓励联合采购、提高军工产能等措施，使欧洲到 2030 年拥有强大的防务能力，包括投入 8000 亿欧元打造“一个安全而有韧性的欧洲”。法国于 2025 年 7 月发布的最新《国家战略评估》报告断言，“美国从欧洲大规模撤军的可能性已不容忽视”。^[2]同月，法国与英国签署《诺斯伍德宣言》，首次明确双方将就各自独立的核威慑力量进行协调，并强调对欧洲构成的任何极端威胁都将引发两国的共同回应，同时将两国核威慑的安全承诺范围拓展至整个欧洲。2026 年 3 月，法国总统马克龙公布了“前沿威慑”核计划，要将欧洲伙伴纳入法国的核保护伞，截止 6 月底已有英国、德国、比利时、丹麦、希腊、荷兰、波兰、瑞典、挪威 9 国加入。同年 7 月，法德英以及意大利、西班牙、乌克兰等欧洲十国领导人联合发布宣言，正式成立“纯防御性质”的反导联盟，构建欧洲自主的弹道导弹防御体系，摆脱对美国反导系统的技术依赖。同月，法德共同宣布，德国军队将首次参与法国的核演习；而芬兰新修订的《核能法》也正式生效，彻底取消了对核武器入境、过境和储存的长期禁令。相关动向是二战结束后欧洲核共享和战略威慑能力建设的历史性一步，标志着欧洲国家开始尝试打造独立的核威慑体系。

在科技领域，欧洲对美国的技术依赖不仅是一个经济竞争力问题，更上升为关乎国家安全与战略自主的核心议题。欧洲超过 80% 的数字基础设施和服务依赖非欧盟供应商^[3]，而美国 2018 年生效的《澄清境外合法使用数据法案》（CLOUD Act，又称《云法案》）允许美方调取美企境外数据。

[1] Anadolu Staff, “Germany’s Merz says EU must be transformed into European defense union,” Anadolu Ajansı, November 17, 2025, <https://www.aa.com.tr/en/europe/germany-s-merz-says-eu-must-be-transformed-into-european-defense-union/3745904>.

[2] Secrétariat général de la défense et de la sécurité nationale, *Revue Nationale Stratégique* 2025, Juillet 2025, https://www.sgdsn.gouv.fr/files/2025-08/20250713_NP_SGDSN_Actualisation_2025_RNS_FR.pdf, p.29.

[3] Mario Draghi, *The future of European competitiveness (Part A: A competitiveness strategy for Europe)*, European Commission, September 2024, p.57.

2026年4月，欧洲技术前景研究所警告称，欧盟27国及英国中有23国的国家安全系统“似乎依赖美国技术”。^[1]为了减少在科技领域对美国的高度依赖，确保数字经济的自主可控，通过扶持本土公司成长以增强欧洲的竞争力，2026年6月欧盟委员会提出“欧洲技术主权一揽子计划”，包含《芯片法案2.0》和《云计算与人工智能发展法案》两项立法提案，以及《开源战略》和《能源领域数字化与人工智能战略路线图》两项战略文件。

在经贸领域，面对美国的关税大棒和不可预测性，欧洲的策略是“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欧盟正加速调整全球贸易布局，寻求合作伙伴的多元化。在欧盟看来，与全球南方国家如巴西、南非、印度、印尼等国深化合作，有助于避免欧洲孤立，维护“基于规则的多边秩序”，并减少对美国的依赖。^[2]2025年11月以来，欧洲多国元首、政府首脑密集来华访问，经贸合作是核心议题，达成了多项实实在在的合作成果。2026年1月以来，欧盟分别与南方共同市场、印度和澳大利亚达成自贸协定，与墨西哥签署包含新版自贸协定的《欧盟—墨西哥经济伙伴关系、政治协调与合作协定》升级版。欧盟这一系列经贸布局，意在打造疏离美国的自贸圈。

（三）引发国际关系调整

美国对跨大西洋关系的重塑既是国际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的结果，又对国际格局产生了影响。大国关系尤其是中、美、俄、欧之间的关系，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美国从原来联欧抗俄，转为与俄妥协、对欧施压，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欧洲安全格局。欧盟面临前所未有的战略压力，对美关系遭受特朗普政策的冲击，对俄关系因乌克兰危机而彻底破裂，加强对华关系似乎成为欧盟突破当前困局的一种选择。为此，欧洲政要显著加强了同中国的接触，形成中欧“外交热”。

[1] Future of Technology Institute, *Cloud Defence: An exposed European flank*, April 2026, https://futureinstitute.tech/assets/doc/CLOUD_REPORT.pdf, p.1.

[2] Guillaume Duval, “The End of the ‘West’ and Europe’s Future,” Social Europe, February 28, 2025, <https://www.socialeurope.eu/the-end-of-the-west-and-europes-future>.

同时，跨大西洋关系的调整也推动世界进一步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特朗普的贸易保护政策和反复无常的行事风格，促使美国的欧洲盟友重新审视对美依赖，转而寻求多元的合作伙伴。美国的其他盟友同样在推行多向度的外交政策，转而与所有主要行为体发展关系，力求减少对单一盟友的依赖。^[1]在多元世界中，全球力量格局与联盟关系将因具体议题和时势而异。各国将避免结成僵化的联盟，转而采取“对冲”策略，或在大国竞争中保持不选边站队的立场。^[2]换言之，一个国家可能在特定议题上倾向于某一大国，但同时与另一大国在其他领域甚至是相关领域保持稳固联系。特朗普或许能迫使盟友增加国防开支，但代价是美国那些中等规模的盟友之间加强安全合作的理由更充分了，这种合作要么绕开美国，要么尽量减少对美国的依赖，从而削弱美国的影响力。^[3]正如加拿大总理卡尼在 2026 年 1 月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呼吁的那样，“中等强国”必须团结起来以求自保。^[4]这也是当前国际格局演变中“中等强国”群体作为独立的战略行为体加速崛起、主动塑造多极化秩序的表现。“中等强国”虽不具备体系性霸权或全球性大国的综合实力，但其地缘位置、经济分量或区域影响力使其在大国竞争中成为关键的“摇摆变量”。在传统西方同盟凝聚力减弱、以美国为中心的联盟体系吸引力下降的背景下，“中等强国”更倾向于通过联合自强与议题结盟

[1] Hakim Ben Hammouda, *Multi-Alignment and De-Risking: The Global South Response to World Fragmentation*, Institut français de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October 31, 2024, https://www.ifri.org/sites/default/files/2024-10/ifri_ben_hammouda_multi_alignment_derisking_2024.pdf.

[2] Amitav Acharya, “The Decline of the West and the Rise of ‘the Rest’ Will Lead to a New World Order,” Chatham House, September 15, 2025, <https://www.chathamhouse.org/publications/the-world-today/2025-09/decline-west-and-rise-rest-will-lead-new-world-order>.

[3] Samir Puri, “President Trump’s Tariffs Increase Pressure on Allies to Reduce Security Dependence on the US,” Chatham House, April 15, 2025, <https://www.chathamhouse.org/2025/04/president-trumps-tariffs-increase-pressure-allies-reduce-security-dependence-us>.

[4] World Economic Forum, “Davos 2026: Special address by Mark Carney, Prime Minister of Canada,” January 20, 2026, <https://www.weforum.org/stories/2026/01/davos-2026-special-address-by-mark-carney-prime-minister-of-canada/>.

在大国博弈中拓展政策空间，进而客观上推动国际权力结构的分散化，加速多极化格局的成型。

四、特朗普第二任期重塑跨大西洋关系的前景

新一届特朗普政府通过极限施压和交易式手段，单方面改变游戏规则，将跨大西洋关系从一个基于共同价值观和安全互信的“联盟”，重塑为一个“欧洲需付费购买美国安全和市场准入的交易关系”。而美国战略的剧烈转向，也必将迫使昔日的盟友作出同样剧烈的调整。^[1]跨大西洋关系在多重力量的复杂博弈中，正迈向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

一种情况是特朗普成功重塑了跨大西洋关系。美欧传统同盟关系被持续改造，其内涵、规则与互动模式被迫调整，一种更符合美国利益的“交易型”同盟形成，美国可能会试图通过对双边贸易协定和防务费用分担的强硬谈判，迫使欧洲盟友在经济和安全领域做出更多让步，从而在形式上达成一种“不对称的平衡”。

另一种情况是重塑失败。新一届特朗普政府基于胁迫和强加的联盟重构政策极易触发欧洲的战略反制与疏离倾向。若美国采取激进的孤立主义政策，甚至威胁退出北约或对欧设置大规模关税壁垒，跨大西洋关系将面临“功能性瘫痪”风险：虽维持表面的盟友关系，但实质合作机制停摆，甚至在极端情况下走向分裂。

就影响跨大西洋关系走向的关键变量而言，美国国内政治变化无疑是最重要的因素。当前欧洲国家普遍采取“战略忍耐”策略，其底层逻辑在于将特朗普的执政期视为一种历史异常，并寄希望于美国政治钟摆的回摆。这种“等待下一位重视欧洲的美国总统回归”心态使得欧盟在面对美国压力时并未选择彻底决裂，而是通过拖延战术和对美妥协让步来缓冲冲击。^[2]正

[1] Robert Kagan, “Every Nation for Itself,” *The Atlantic*, Vol.337, No.3, March 2026, p.57.

[2] 参见 Philip H. Gordon, Mara Karlin, “The Allies After America,” *Foreign Affairs*, Vol.105, No.1, January/February 2026, p.144; Matthias Matthijs, Nathalie Tocci, “How Europe Lost,” *Foreign Affairs*, Vol.105, No.1, January/February 2026, pp.154–165 等。

如欧洲主流媒体所描绘的，欧洲国家试图“打开支票簿”，通过大幅增加防务开支，购买美国武器装备，来稳住这位美国现任总统。^[1]欧洲重整军备的进程将推动价值 3000 亿美元的对美武器采购订单，支撑美国 19.5 万个国防就业岗位。^[2]2026 年 7 月，北约秘书长吕特在北约峰会国防工业论坛上宣布了数百亿欧元的新采购合同，以取悦特朗普。然而，美国政局变化这一变量具有双向性：若特朗普的 MAGA 理念被共和党永久化，欧洲的“美国幻想”将彻底破灭，被迫进入“后美国时代”的战略自主构建期，在安全和防务领域将加快降低对美依赖，推动跨大西洋关系向更加平衡的伙伴关系转型；反之，若民主党在下届美国大选中重掌政权，跨大西洋关系虽可能得到修复，但也难以回到所谓“自由国际主义的黄金期”，因为美国两党均已呈现出战略焦虑，保障欧洲安全已不再是美国的战略重点，欧洲无法再依托单一政党的执政周期获得稳定的跨大西洋安全预期。因此，无论美国国内政治钟摆如何摆动，欧洲“安全上靠美国”的路径依赖大抵难以为继。

地缘政治环境与欧洲内部政局的演变构成了重塑跨大西洋关系的另外两个关键变量。在地缘层面，乌克兰危机的持续凸显了欧洲对美国安全庇护的现实需求，强化了同盟存续的必要性，同时也暴露出同盟内部在战略目标、利益诉求及政策执行上的深刻分歧，而中东局势的动荡则进一步放大了这些分歧。美国与北约欧洲成员国关系的紧张，揭示了同盟中一个现实的问题，即“一个盟友的安全利益是否构成另一个盟友的义务”。^[3]而在欧洲内部，政治光谱的右倾化与碎片化增加了欧盟形成统一对美政策的难

[1] Henry Foy, “NATO opens its cheque books in bid to keep trump engaged,” *Financial Times*, July 7, 2026, <https://www.ft.com/content/20f75130-99d6-443e-a2bd-99323b1de289?syn-25a6b1a6=1>.

[2] “Europe’s rearmament drive is sustaining 195,000 US defence jobs, Nato chief says,” *Financial Times*, June 30, 2026, <https://www.ft.com/content/b0e09632-81b9-43ee-881e-f14712c5d7b6?syn-25a6b1a6=1>.

[3] Florence Gaub, Jonathan Heist, “NATO’s Permanent Crisis,” *Foreign Affairs*, June 16, 2026,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united-states/natos-permanent-crisis?check_logged_in=1.

度。一方面,欧洲国家的右翼政府可能与特朗普政府在意识形态上产生共鸣,削弱欧盟内部的对美谈判立场;另一方面,法国和德国等核心国家推动战略自主的决心愈发坚定,加速构建独立于美国之外的欧洲防务体系。这种内部分歧使得欧洲难以作为一个整体与美国进行博弈,从而增加了跨大西洋关系的不可预测性。欧洲内部的政治风向,特别是自由主义力量与右翼民粹力量的消长,将直接决定欧洲选择以何种姿态面对美国和定义自身。

若欧洲右翼民粹力量在各国选举中持续做强乃至主导政坛,跨大西洋关系的走向可能显著偏向美国期待的轨道。欧洲右翼通常持有与美国MAGA阵营相似的价值观,强调主权国家主义、传统社会规范以及对外部威胁的强硬态度等。许多右翼政党(如法国国民联盟、意大利兄弟党部分派系)在政治上推崇主权民族国家,对欧盟超国家主义心存疑虑;在安全上更倾向现实主义,视俄罗斯为需要防范或对话的国家而非纯粹的“价值观敌人”;在经济与文化上则持保护主义立场,其理念与特朗普的经济民族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逻辑高度契合。一旦右翼力量掌权或执政根基进一步稳固,他们可能更乐意接受一个由美国主导、以传统硬实力和明确阵营划分为特征的同盟体系,在防务上继续倚重北约而非全力推动欧盟独立防务。其结果将是美欧同盟在形式上得到“巩固”,但实质上演变为一种更为工具化、交易化的联盟。

反之,若欧洲的自由主义建制派力量能够守住基本盘,凝聚中间力量,有效回应民众诉求,那么欧洲走向“战略自主”的步伐将会更加坚定。自由派精英尽管内部有分歧,但总体上更坚信多边主义、所谓“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秩序”以及欧盟作为一体化实体的战略价值。他们对美国政策的摇摆性、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倾向怀有更深忧虑。在此情况下,欧洲将更坚定地推动自身防务能力建设和在国际舞台的独立自主性,并且在对外关系上,欧洲将更敢于说“不”。在欧洲看来,美国不能一方面放弃对欧洲防务的支持,另一方面又强迫欧洲人按照MAGA的理念进行改造。^[1] 欧洲希

[1] “The Meaning of ‘America First’ Is in Flux,” *The Economist*, January 19, 2026, <https://www.economist.com/united-states/2026/01/19/the-meaning-of-america-first-is-in-flux>.

望主动塑造即将形成的国际新秩序，而非被动接受大国竞争的结果。^[1] 一个更加独立自主的欧洲，短期内必然伴随更多的跨大西洋摩擦、博弈与协调成本的上升，同盟关系将经历“动摇”与阵痛；但从长远看，或能催生一个更成熟、基于对等相互依赖的新型跨大西洋关系模式。

未来跨大西洋关系将向何处去？就美方愿景而言，在未来的北约中，欧洲将承担主要常规防御职能，而美国则提供战略实力与全球影响力支持；在未来的跨大西洋联盟中，美国期待其在军事上可靠、政治上持久、战略上务实；由此定义的新跨大西洋关系，将不再受制于依赖逻辑或脱离现实的陈词滥调，而是由美欧共同的力量与基于灵活现实主义的共同准则所塑造。^[2] 相比之下，欧方的愿景亦有三层：在未来的地区安全架构中，欧洲将承担欧洲大陆安全的主要责任，同时以跨大西洋合作为重要补充；在未来跨大西洋联盟定位上，欧洲追求基于实力对等的伙伴关系，拒绝沦为美国的附庸；在未来跨大西洋关系的塑造上，以欧洲独立自主和共同利益为基础塑造新关系，最终以强大且自主的欧洲支撑更强大的跨大西洋联盟。^[3] 美欧双方的愿景在共同承担防务责任的方向上存在显著交汇，但美方更倾向于将欧洲的独立担责视作同盟存续的前提条件，欧方则将战略自主视为巩固同盟的内生动力。由此可见，跨大西洋关系彻底崩塌的可能性不大，但维持现状的可能性也不大，美欧关系可能会经历一段时间的震荡与偏移再

[1] European Commission, *White Paper for European Defence – Readiness 2030*, March 2025, https://commission.europa.eu/document/download/e6d5db69-e0ab-4bec-9dc0-3867b4373019_en?filename=White%20paper%20for%20European%20defence%20%E2%80%93Readiness%202030.pdf, p.2.

[2] U.S. Department of War, “Remarks by Under Secretary of War for Policy Elbridge Colby at the NATO Defense Ministerial (As Prepared),” February 12, 2026, <https://www.war.gov/News/Speeches/Speech/Article/4404801/remarks-by-under-secretary-of-war-for-policy-elbridge-colby-at-the-nato-defense/>.

[3] 参见 European Commission, “Speech by President von der Leyen at the Munich Security Conference 2026,” February 2026,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da/speech_26_414; Emmanuel Macron, “Speech by the President of the Republic before France’s Ambassadors,” January 8, 2026, <https://www.elysee.fr/en/G7evian/2026/01/08/conference-of-ambassadors> 等。

确定其方向。这一进程并非仅仅由美国单方面塑造，而是同样取决于欧洲对自身身份、价值观与未来世界角色的抉择。其结果不仅将重塑西方内部的力量格局，也将对国际格局的演进产生深远影响。

结 语

美国对跨大西洋关系的重塑，不是单纯的外交政策调整，而是其在全球实力对比结构发生深刻变化背景下，为推进自身利益而进行的战略性重构。美国试图通过重塑安全责任、重构经济秩序及改造欧洲价值观，最大限度地整合欧洲战略资源为美国所用。特朗普既想将欧洲的安全责任转嫁给欧洲人，又试图从欧洲盟友那里获取让步和好处。然而，这其实是相互矛盾的目标，完成责任转移，包括从欧洲撤出美军，必然会降低欧洲在贸易、数字、气候或监管政策方面“掏钱”的意愿。^[1]这一结构性矛盾，不仅暴露了美国单边施压策略的内在限度，更揭示出跨大西洋联盟在西方认为的“权力转移时代”所面临的深层困境，即霸权国试图以收缩换取支配，却可能在收缩中丧失支配的前提条件。美国与其盟友关系的调整，削弱了美国对西方阵营的整体凝聚力与动员能力，从而为全球南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积极作用提供了更大的战略空间，在客观上将加速国际力量格局向更加平等有序多极化演变的进程。

【收稿日期：2026-03-23】

【修回日期：2026-08-24】

（责任编辑：王霄巍）

[1] Max Bergmann, “No Longer Ironclad: America and the Transatlantic alliance,” Clingendael Institute, January 2026, <https://www.jstor.org/stable/resrep78185>.